

朱謙之著

中國思想對於歐洲
文化之影響

衆文圖書公司

朱謙之 著

中國思想對於
歐洲文化之影響

衆文圖書公司

重刊記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國內向稱發達。而研究者頗多重視十九世紀之後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故西方文化對中國所產生的影響，知識份子均能識其大要。其實，一部中國近代史，也可以說是一部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刺激的反應史，許多近代史上的事件均擺脫不了西方文化輻射的陰影。在這種情形下，要扭轉研究方向，重視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實非易事。

在一些研究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的著作中，個人認為國立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朱謙之先生的「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一書是最有體系，最具規模的一本書。這本書體大思精，立論精詳，將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之來龍去脈交待得相當清楚。他首先說明中國文物之西傳形成了歐洲文藝復興之物質基礎，其次說明耶穌會教士接受的中國文化形成了啓蒙運動的精神基礎。他的結論學者恐怕會有見仁見智之辯，但其立論的方向卻是正確的。筆者近譯麥克尼爾著作「歐洲史新論」一書，見該書作者亦肯定蒙古人將中國文化之輸入歐洲，是促成歐洲文藝復興的一項重要的因素。朱謙之先生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是很透澈。這祇是朱著的優點之一。其他有關中國思想對歐洲文化的影響，不是我這篇小序能論列。

這本書是民國二十九年出版。因中日戰爭的爆發，發行的數量並不多。現在要找到這本書的原本是很不容易的事。許多朋友想對這一方面增加一點了解，卻苦於無書可讀。衆文圖書公司搜尋到這本書的一個殘破的舊本，覺得可以重排印行出來，供給知識份子的參考。衆文圖書公司的一向重視文化出版事業，與我亦多所過從，他的這番盛意，我覺得有助於中華文化的復興，很表贊同，促其早日排印出版，以解士林之渴望。

近年來，我國政府及有關單位因積極提倡「固有文化的復興」，設立「中國文化復興委員會」以重其事，其目的無非是想在思潮的激流衝擊之下，鞏固國民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進而更發揚中華的優美文化於世界。用意至爲良善。而年來，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一方面致力於固有文化的整理與發揚，一方面又致力於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的研究，這種雙管齊下的努力，卓著貢獻。朱謙之先生所著「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是一部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著作。而衆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能重排出版，足具遠見，也希望其在這一方面能略棉薄之責。是爲記。

劉景輝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月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

前言

前論

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實以一六四五年至一七四二年天主教徒爭論之禮儀問題，與耶穌會士對宋儒理學之態度爲其關鍵。但欲明此，須先注意中國文化西傳之歷史。以吾所見，十三世紀蒙古征服歐洲，其所傳播之中國文明，實予歐洲文藝復興以物質的基礎，而十六世紀以來，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其所傳播之中國文化，則實予十八世紀歐洲啓明運動以精神的基礎，二者均不可不先加敘述，作前論兩篇：

第一編 歐洲文藝復興與中國文明

第二編 十八世紀中歐之文化接觸

本論

十八世紀歐洲思想界，以爭論禮儀問題，使當時無論迎拒中國哲學之人，均以宋儒理學爲對象。一方有人認中國哲學爲唯物論無神論而加攻擊，一方即有人認中國哲學爲唯物論無神論，而加歡迎。又一方有人認中國哲學之理性說爲異端外道，一方即有人擁護此理性說，而對於中國哲學，曲加解釋。前者之影響，可以法國麥爾伯蘭基（Malebranche）之攻擊中國哲學爲例；後者之影響，可以德國來布

尼茲（Leibniz）之擁護中國哲學為例。前者之攻擊，其反響爲法國百科全書派之無神論的唯物論的哲學；後者之擁護，遂造成德國觀念論之古典哲學。前者之影響，爲法國之政治革命；後者之影響，爲德國之精神革命。作本論四篇：

第一編 耶穌會士對於宋儒理學之反響

第二編 啓明運動與中國文化

第三編 中國哲學與法國革命

第四編 中國哲學與德國革命

目錄

一 歐洲文藝復興與中國文明……………一

一 文藝復興之物質的基礎……………一

二 文藝復興期對於中國之認識……………六

三 馬哥波羅遊記之影響……………一二

四 文藝復興期之中國題材……………一二

二 十八世紀中歐之文化接觸……………二六

一 中歐文化接觸之三時期……………二六

二 耶穌會.....	四五
三 西學東漸之初期.....	五五

本 論

一 耶穌會士對於宋儒理學之反響	六八
-----------------------	----

一 禮儀問題與耶穌會士之態度	六八
二 耶穌會士之孔教觀	七七
三 反理學之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八一
四 反理學在中國所生之影響	九九

二 啓明運動與中國文化	一二
-------------------	----

一 所謂『理性時代』	一二
二 啓明運動之先驅 笛卡兒 (Rene Descartes)	二七
三 來布尼茲 (Leibniz) 與宋儒理學之關係	四一

三 中國哲學與法國革命	一七三
-------------------	-----

一 哲學與大革命	一七四
----------------	-----

二	百科全書派與中國思想的關係·····	一八四
三	重農學派·····	二一〇

四	中國哲學與德國革命·····	二二五
---	----------------	-----

一	德國古典哲學之革命的性質·····	二二五
二	古典哲學與中國文化·····	二三四
三	叔本華 (Schopenhauer) 之中國文化觀·····	二三九

附錄

一	中國思想派別及其對於歐洲文化影響之不同·····	二四三
二	宋儒理學傳入歐洲之影響·····	二八一

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

前 論

第一編 歐洲文藝復興與中國文明

一 文藝復興之物質的基礎

什麼是文藝復興？培忒 (Walter Pater) 在 *The Renaissance* 中開頭便告訴我們，文藝復興實以十二世紀的結局爲分界線，不但指古典的復興運動，實指西方文化之一的覺醒。西蒙茲 (John Symonds) 在 *Renaissance in Italy* 中，更明白指出，這種覺醒，是歐洲人民對於中古文化發生的一種反動。這種反中古文化的新運動，影響所及，有意大利、英、法、及日耳曼等國。但是就他和中國思想的關係來說，則此時代便是歷史家所說的希臘精神的復古，和中國精神尚未發生密切的關係。十三世紀和羅馬教皇爭執的腓特烈第二 (Frederick II,) 乃是希臘精神的代表，和十八世紀開明專制君主普魯士腓特烈第二 (1740-1786) 之代表中國精神者，絕不相同。文藝復興乃是希臘古學復興的一個旗幟，人文學者所代表的是希臘狂，不是十八世紀學者的中國狂。他們直接的精神導師，是希臘的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不是中國的孔子。雖然如此，文藝復興固爲歐洲精神文化的新誕生，而此精神實有牠物質

底基礎的。中國文化曾給十八世紀歐洲以精神的基礎，同樣地在十三至十六世紀，曾給文藝復興以物質的基礎。文藝復興與以上古希臘羅馬的入世觀念爲其精神基礎，同時實受到中國之重要發明，爲其物質的基礎。

我們研究西方文化東漸史，知道亞歷山大（Alexander）曾傳佈希臘文化於東方各國，同樣英史家威爾斯（H. G. Wells）卻告訴我們，以十三世紀蒙古征服歐洲，其傳佈中國文化，和亞歷山大之傳佈希臘文化，實可相提並論。法國東方學者萊麥撒（Abel-Remusat）曾論元代世界大通東西文明接觸所發生的影響，極爲詳盡。他指出蒙古人所傳東方文化，有如下六項：（1）羅盤針（2）火藥（3）鈔幣（4）戲賭紙牌（5）活字版印刷術（6）算盤等。因爲十三世紀元拔都西征歐洲，對於東西民族文化之接觸混合，影響很大。元代版圖混一歐亞，而驛站與海運的發達，遂使東西文化交通，極爲便利，因而引起無數革命的觀念和革命的事物以入歐洲。如威爾斯所說似的，我們平常祇注意蒙古人的戰爭和屠殺，卻沒注意到他們對於學術上的好奇心實則單就蒙古民族之傳播知識和方法來說，在世界上便有很大的影響了。因爲元代中國之物質文明對於歐洲人的生活影響很大，所以即至一五六三年，那位印度藥用植物論的著者達俄塔（Garcia da Orta）聽見有人說中國皇帝是野蠻君主的時候，尙極力辯護，證明了即在物質方面『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好。』

然而中國文明能給歐洲文藝復興以物質的基礎者，卻不能不首數中國之四大發明。卡德（T. F. Carter）在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的緒論中，曾

舉出四大發明，即一爲造紙，二爲印刷術，三爲火藥的發明，四爲羅盤針的發明，均對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有很大的影響，而此四大發明，均以中國人佔最重要的地位。威爾斯歷史大綱中，亦將此大發明的傳播，歸功於無名之馬哥波羅（Marco Polo）現在試分述之如下：

(一) 造紙

我們知道文藝復興是把人類的知識容量提高擴大，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印刷的材料——「紙」了。但造紙之法，實爲中國人所發明，其事見後漢書蔡倫傳，時在紀元一百〇五年，在他以前，已有絲屑所製之紙，可見很早就發明了。哥倫比亞中國文化教授赫特（F. Hirth）和高本漢（Kalgren）等均極注意中國紙和歐洲文明的關係。德國亞可布（Georg Jacob）論東方對於西方文化之影響。告訴我們「希臘羅馬的人，從來沒有想到紙的發明，我們還是靠中國人蔡倫的智慧，纔能享受現在這種便利；」接着還述及造紙術輸入歐洲的一段小史。把他和卡德（Carter）所作『紙自中國輸入歐洲之路程圖』比看一下，便可以看出紙的發現和文藝復興的關係了。關於這一點，威爾斯歷史大綱第三十四章第四節 How Paper Liberated the Human Mind 說得最爲明白，他以爲歐洲文藝復興，可以說是完全得力於中國傳入之紙的。

(二) 印刷術

印刷術和造紙一樣，兩者同爲文藝復興期宗教改革及民衆教育的基礎。中國印刷術之傳入歐洲，許多人歸功於馬哥波羅，據意大利的一種傳說，馬哥波羅曾從中國帶來一些雕板，至威尼斯，遂傳其術於十四世紀之卡斯他爾地（Pamphilio Castaldi of Feltré）以刻字知名。但這種傳說，威爾斯「歷史大綱」和卡德「中國印刷術源流史」，均認爲不甚確切，不過歐洲印刷術實發源於中國，這卻是真的。中國雕板印刷，在第十世紀便有很大進步，燉煌的新發見，即爲好例。直至元人西征，此時中國印刷術，已發達到最高頂點。而蒙古軍隊經過的地方，均與歐洲早年採用雕板印刷的地方相近，不能謂其絕無影響。雖此種影響，其詳情不大可考，但在蒙古史中，仍有痕跡可尋。一五五〇年歷史家佐維瓦斯（Paulus Jovius）

曾主張中國印刷術傳入歐洲，係假道於俄國。亞可布教授更論到活字板印刷術，以爲『活板印刷也是在一〇四一到一〇四九年間，由中國畢昇發明，再由中國傳到高麗與日本。我們現在雖然不能夠明確地說出活板印刷怎樣傳到歐洲，但是最近在東亞又發現活板印刷的書籍，遠在古騰柏（Gutenberg）以前。』雖然伯希和（Pelliot）在燉煌千佛洞所發現之維吾兒活字，與漢字不同；而活板印刷既經在中國發明，活板印刷在當時中亞又甚流行，則在文藝復興的初期，傳入歐洲，也是很可能的事。自有活板印刷以後，歐洲的人，纔能得到便宜書籍，而文藝復興的種子，也如雨後春筍一般蓬發起來了。

（三）火藥

火藥對於文藝復興的貢獻，在於消滅封建社會的堡壘，因而剷除了封建制度，建立民衆自衛軍的基礎；但火藥也是中國的發明品，西傳歐洲的。最初本爲鞭炮之用，至宋則用之以作戰。一一六一年一一六二年宋、金之戰，一二三二年金、元之戰，均使用火藥。一二一八年成吉斯汗陷落喀什噶爾（Kashgar）浩罕（Khohand）布哈拉（Bokhara）以及花刺子模（Khwarizm）都撒馬爾干（Samarkand）諸城，其軍人也學中國人，具有火炮，火藥以備攻城之用。亞可布教授說火藥與歐洲文化的關係，以爲『中國火藥實奠定了歐洲新式戰爭的基礎。古代希臘和中世紀沒有用炸藥。……馬庫斯格庫斯（Marcus Graecus）遺留下來一張製造火藥的單子，上面的確寫得有硝、煤、硫黃。以前大家錯把馬庫斯當成第九世紀的人，所以引起許多誤會，現在我們的確確知道他在一二五〇年寫這本書，並且還受了阿剌伯人的影響。』又有人說火藥是希瓦慈（Bertold Schwartz）一四五四年發明的，這也是錯誤。火藥裏邊最主要的成分，硝，最初是中國發明的，但是頂早是在十二世紀中葉纔被一般人知道的。關於中國人一二三二年在汴京，現在河南開封，勇敢地抵抗蒙古征服的事情，中國史書上有明文記載，這裏邊我們第一次發現，用炸

藥來轟擊敵人。在十二世紀的時候，阿剌伯人也從中國那裏知道火藥了，他們叫火藥做「中國的雪」，叫火器作「中國的箭。」在阿剌伯一二七五至一二九五年出來的一本講火器的書，確已經成了基本的成分。同一的作者，還第一次描寫魚雷，巴黎的抄本上面，有一個圖畫繪出東方最古的大砲的形狀。牛津大學圖書館鈔本上，也有一個插畫。我們用手用炸藥的先驅，當然要算弩箭。弩箭在中國紀元前十二世紀已經發明，紀元後第四世紀，歐洲纔有。』而且依據卡德所說，歐洲著作家最早述及火藥的，當推培根（Roger Bacon），培根是十三世紀人物，他知有火藥，是由於讀阿剌伯故事書，或從中亞旅行家盧白魯克（Rubruck）間接得來則不甚可考，而要之歐洲人知用火藥是從中國傳來卻是一種歷史的事實了。

（四）羅盤針

羅盤針也是由蒙古人而輸入歐洲的。在中國發明很早，王充論衡是應篇『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指南指』說者謂即後漢初我國發明羅盤針的鐵證。但一般學者，均認中國及世界書籍，首先涉及羅盤針者，當推十一世紀沈括的『夢溪筆談』，與朱或的『萍洲可談』，『大概在十一世紀末期與十二世紀初期，即已使用。歐洲文獻則直至十二世紀末期與十三世紀初期，阿剌伯方面關於羅盤針的記事，亦始於十三世紀初期。可見羅盤針實為中國發明，而西傳歐洲的。』亞可布教授曾說及羅盤針對於歐洲文化的影響，以為『羅盤針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發明，牠放開我們的眼界，領導我們到世界主義。我們近代的世界觀的形成，全靠深入異邦文化的精神，只有羅盤針的發明，纔能夠幫助我們到這種境界。希臘羅馬的航行，只限於沿海，地中海那樣一個小海，佔據了四周的土地，人文主義者就以爲這是世界帝國了。』這不是挖苦歐洲人的話，實在希臘羅馬時代，固也知道磁石，但不知道牠指定方向的力量，而在中國方面，則在哥倫布很早以前，已經發現了磁針的方向。卡德說及歐洲人最早言及磁針的，爲一一九〇年普羅凡（Guyot de Provins）

所作的詩，還有維特利僧正（Cardinal de Vitry）以爲磁針係由印度傳來，實則中國人發明最早，阿刺伯人則用之於航海，因而傳入歐洲。但依近來研究的結果，航海羅盤針在中國十一世紀的末期已經講到。知道航海羅盤針爲中國所發明，又知歐洲在十四十五兩世紀航海均藉助於羅盤針便知文藝復興時地理上的大發見，不得不感謝我們中國人了。

由上所述已知文藝復興之物質的基礎，如紙，印刷術爲教育改革的基礎；火藥爲鏟除封建制度，創立民衆自衛軍的基礎；羅盤針爲地理上大發見的基礎。總結起來，不是很容易看出文藝復興的物質基礎，完全依靠中國的重要發見嗎？孔德（Auguste Comte）在『實證哲學講義』中，曾以三大發明之歷史，說明近代進化之第一時期；並將此等發明，歸功於東方亞細亞之某民族。威爾斯更明確地指出中國發見之羅盤針及紙，對於歐洲精神上物質上及社會上的影響。可見文藝復興時代，即使中國沒有重大之精神的貢獻，但就上面所述，對於歐洲之物質的貢獻來說，已經是劃時代的歷史事實了。

二 文藝復興期對於中國之認識

我們再來觀察一下文藝復興期中歐洲人對於中國之認識。在十三世紀蒙古人勃興時代，藉蒙古人之力，東西兩大文明，中國系（中國高麗日本安南皆屬此系）與希臘羅馬系（今歐美各國，皆屬此系）始實行接觸。法國東方學者萊麥撒（Abel Remusat）記載當時盛況，東西交通除不知名的商人教士以及隨從軍隊以外。有名人物見於記載，和歷史上偶然數及歐人之爲謀利或好奇而來東方者，還不知幾多。就有東羅馬西羅馬及日耳曼法蘭西的遊歷家，商人，教士，或充大使往蒙古大汗都城的，由於這些人物所作遊記，或所通信件，不但可供研究當時東西交通的史實，且可由之而窺見歐洲當時對於中國的認識。現試分述

之如下：

A. 教士

當時歐洲帝王教皇有熱心聯絡蒙古的，一爲羅馬教皇殷諾深爵第四（Innocent IV），一爲法蘭西王路易第九（Louis IX），他們派遣教士使者到和林或北京，大概爲着幾個目的，第一請蒙古人在歐洲境內，勿行殺戮；第二勸化蒙古人改信基督教，第三欲藉蒙古之力，來抵制土耳其人收回聖地。因此而出使東方者，前後有高僧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盧白魯克、約翰孟德高維奴（Jean de Monte Corvino）、馬黎諾里（John de Marigoli）等。聖方濟各派鄂多立克（Odoric）爲中世紀西方四大遊歷家之一，其來遊中國，要亦不外出於宗教的熱忱。雖然這種聯合蒙古和宣傳基督教的計劃，以後終成失望，但就其對於中西文化交通上的貢獻，卻增加了不少新的材料。

1. 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

一二四九年勃拉奴克劈尼奉教皇命派使蒙古，其所作遊記第九章，記述契丹（Cathay）略云：『契丹人雖爲異教徒，但自有文字，有信仰，且信靈魂不滅之說，祇有一點和我們不同，即沒有洗禮。對於聖經和基督教徒，頗知崇敬，爲人樂善好施，溫文有禮，無鬚鬚，面貌和蒙古人略同，有特殊的言語，精於工藝，其技巧在世界上得未曾有，地富饒，產生一切養生之物，如五穀、酒、金、銀、絲等。』

2. 盧白魯克（Rubruquis）

一二六三年奉法蘭西國王之命，出使蒙古，其所作遊記，有一章記述大契丹（Great Cathay），以爲即古代賽里斯國（Land of the Seres），產絲之佳，世界無比。國中有一城市，以銀爲城牆，以金爲城堞，人民精於各種手藝，世代相傳，醫術尤妙。通行紙幣，上蓋蒙古大汗的玉璽，寫字用毛刷，和畫工

所用的刷略同，文字則常合數字而成一字云。

3. 約翰孟德高維奴 (Jean de Montecovino)

一二八九年奉教皇命派往中國傳教，曾寫三封信給西方友人報告遠東情形。就中一二三〇五年一函，在汗八里 (Carnabalec 北平) 所發，報告在契丹傳教並在京城築建教堂和領洗等事。最後一段，極稱大汗土地廣大，人口衆多，財富充裕，普天下更無第二。次年又有一函，由教士帶回羅馬，說及汗八里城之大，大汗所轄國境之大，並明顯地指出京城裏異教各宗派，其克己之嚴，有過於拉丁僧人云。

4. 安德魯 (Andrew of Perugia)

一二三〇七年安德魯和主教等六人，奉教皇命往契丹，一二三六年自泉州寄一函敘述東方情形，此函和約翰孟德高維奴的兩封，現均存於巴黎國立圖書館，書中述及所見汗八里和刺桐 (Zaiton 泉州) 的繁榮盛況，謂其國富兵強，土地之大，人民之衆，城邑之多，簡直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而且在此大帝國境內，無論何國人民，均可自由居住與自由傳教云。

5. 鄂多立克 (Frier Odoric)

鄂多立克爲元時東方傳教最著名的人，一二三四年即開始傳教旅行。在北京時，授洗奉教的有二萬餘人，內有多名，均居要職，及後奉命西歸，遊歷山西、陝西、四川各省，至於西藏。其所作旅行記，各國均有譯本，漢譯題『眞福和德理傳』，其中所記東方事物，如婦女纏小足，富貴人留長指甲等，均爲馬哥波羅遊記中所無。述及在北京時經歷『一日皇上由上都回京，吾等探知歸期，余本主教攜帶會友數人，出迎於二百里外。……此時上見吾等高舉十字，恭迎道左，即免其冠，冠上有珠，乃稀世之寶，無人可估其價』云。

6. 馬黎諾里 (John de Marignoli)

一三三九年奉教皇命，同三十二人報聘中國。一三四二年到汗八里，住三四年，始南下至刺桐港，其所作『波希米亞史中東方見聞記』，後人加以整理，題爲『教皇專使小級僧約翰馬黎諾里奉使東方錄』述及中國印度甚詳。描寫韃靼大汗，國威所及，幾有東方世界之半，兵強國富，城邑之多，各民族在其境內者之衆，簡直駭人聽聞。經蠻子國 (Manzi) 時，所見光華燦爛的世界，更非文字筆墨所能形容，自羨眼福不淺。蠻子國所轄有三萬大城市，村堡無數，其疆土之大，幾於不能使人相信。物產豐富，尤其水果爲拉丁諸國所無。康勃綏 (Campasy 杭州) 最著名，其富麗繁華，建築物的雄壯，古今無比。前人曾稱此城有一萬座的美麗石橋，窮極雕刻，初以爲不甚可靠，今皆一一證實。還有刺桐城爲一大商港，物富民殷，可見太平景象。馬黎諾里此次使節，遞呈國書外，並獻戰馬、美酒、與教皇贈物；其中獻馬一事，元史記載以外，私家所記與文人歌詠，頗極一時之盛。

B. 商人

元代不但教士東來，西方商人，亦集合於和林，汗八里各地。劫拉奴克劈尼 (Plano Carpini) 往中國時，同行有伯萊斯勞 (Breslau 德國東方大城) 波蘭及奧大利的商人。由俄國歸時，又有熱那亞 (Genoese) 皮撒 (Pisans) 及威尼斯 (Venetians) 商人相伴，不過這些商人均爲不知名的人，茲述有名商人之見於記載者如下：

1. 尼古刺波羅 (Nicolo Polo)

威尼斯市商人尼古刺波羅同瑪寶波羅 (Matteo Polo) 兄弟二人，於一二六〇年 (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 決議赴黑海營商，於是購買珍寶，自君士坦丁堡出發，沿海路到速達克 (Sondak)，騎